

李大釗的悲哀

(本文插圖刊第2、73、74頁)

吳鑄人回憶錄(二)

●吳鑄人原著·王成聖校訂

張作霖查抄俄使館

共產黨員胸懷異志

民國十六年，張作霖對國民黨不利於他的各種地下活動，感到如芒在背，寢食難安。於是終於在十六年四月遽下毒手。在此之前，三月廿日下令大肆逮捕北京各大學學生一百三十餘人。於四月六日這一天，不顧使館治外法權，公然派遣軍警闖入俄國大使館逮捕國共兩黨黨員達七十餘人。事發之後，舉世矚目，中外譁然。

如前所述：民國十六年春，由於張作霖對革命黨人的迫害捕殺日甚一日，風聲愈來愈緊。為了因應情勢需要，國民黨在北京的大本營就暫時隨同共產黨，搬進東交民巷的俄國大使館內的中東鐵路辦公處。藉外交來掩護我們的地下工作。

「三一八」後，國民黨北京政治分會的主要人物，顧孟餘、丁惟汾、李石曾、朱家驊諸先生因被通緝離京，在國共合作的前提下，分會即由委員之一的李大釗先生主持其事。

在俄使館內，國共兩黨黨員分在兩處辦公：共產黨同志在俄使館本部，國民黨同志在中東鐵路辦公處。兩幢建築物對門而立，中間隔一條過道。

當時我担任北京政治分會及北京市黨部之對外聯絡及交通事宜。有任何公函指令發交下級黨部，或下級黨部在任何文件消息呈報政治分會或市黨部，均由我負責。我把北京分成若干區，各區設秘密交通站，建立嚴密的交通網，一有消息或情報即可輾轉傳遞。我把這個工作做得很靈活，勝任愉快。

在國共合作期間，有一件頗不尋常的事，值得一提。李大釗先生經常在俄使館對我們作政治報告——約每兩週一次。他的報告除了提供消息，分析時勢之外，也算是對我們做一種政治講話和訓練。但是有一次，約在十五年的冬天，他報告說我們北伐軍蔣中正總司令在南昌造幣廠吃了敗仗，而且膀臂受了傷，至於傷勢如何，則不得而知。李大釗先生是根據日本產經新聞報紙的消息（他早先是留日學生）做成的報告。我聽了這

個報告當下就感覺有點疑惑。為什麼呢？因為李大釗先生是當時國民黨北京政治分會實際負責人，關心北伐總司令的安危，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拿未經證實的消息來對我們講，這裏面恐怕就別有用心了。後來經查證，這個消息果然是誤傳。我對李大釗先生的人品、學問一向欽佩，至今仍然推崇，不過由於上述事件，使我對他的政治立場起了懷疑，後來更慢慢的體認到共產黨雖然表面上與國民黨通力合作，暗地裏却胸懷異志。

為了行動上的安全，我有時住在北大西齋，有時住在胡適之先生家，有時住大同中學，居無定所，行蹤飄忽。後來我也常在東交民巷俄使館掛單。這項安排，除了為本身安全與工作方便以外，也想想近多了解一點共產黨的活動。陳毅時任共產黨北京市黨部委員，我們常在俄使館碰面，在工作上互相協助，他是一個有志氣有革命決心的青年鬥士。我們也常在一起交換兩黨不同的意見。

張作霖查抄北京俄使館，發生在民國十六年四月六日，農曆三月初五，正好是清明節，當時

也稱這一天為植樹節。

我當時任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第一區黨部（黨部設在北大西齋）委員，兼宣傳組組長，並兼管市黨部的情報交通工作。在事件發生前數日，剛好有重要情報、文件及印信由上面交下來，要我們送到第十七區黨部。第十七區黨部設在清華大學，工作範圍包括清華、燕京、中法三個大學以及西山中學和香山慈幼院，同時還有指示，要在該地區設立若干區分部。由於傳達文件及印信必須出西直門，而當時出入人等全要遭憲警的搜查，所以任務非常重大而艱險，我考慮再三，決定不找其他同志去執行，而由我自己去完成。於是立刻擬妥了執行計劃，選擇四月六日植樹節這一天去完成使命。

利用郊遊完成使命

四月五日那天晚上我就準備好了一切。找到關係最密切的幾位同志——我的老師胡適之先生的堂弟胡成之，胡成之的女朋友賈美麗，我的兩個女學生張文英和吳清華，還有一個女師大學生劉仲鶴，就是我在現在的太太，以及她的妹妹，連我一共七個人。連絡時，我只告訴他們明天請他們到西山去郊遊。關於送情報印件的事，隻字沒提。瞞着他們，是恐怕萬一讓他們知道真相，到時候一緊張張露出張惶失措的神色，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在約會時，除告訴他們郊遊外，還告訴他們：「關於野餐食物和交通工具，全歸我老吳負責，大伙兒只管去玩就是了。」

四月六日一早，我租了一輛汽車往西山。那

時汽車沒有乘客人數限制，我們一共坐了七人，大家有說有笑，又唱又鬧，別有一種年輕人特有的活潑朝氣。還記得那輛車子還有兩個倒坐（面向後的座位），後面坐三人，前面除司機外坐二人。車資為兩塊銀元。民國十六年兩塊大洋（銀元）跑一趟西山，算是一筆很大的開支。一路上我雖然表面上和大家談笑風生，不露聲色，心裏却為此行吉凶未卜，難免略感緊張。

到了西直門，守城衛兵一看我們這麼多人擠在一輛車上，個個神采飛揚；再看籃子裏塞滿野餐食品，的確是去郊遊的青年學生，所以一揮手就放我們過去了。

其實我籃子底層放的是文件和印信，上層放的是各式水果，最上面放的是麵包、果醬、牛油、薰鵝、醬肉等食品。所以衛兵即使翻動檢查，也不易發現秘密。加之當天風和日麗，出西直門到西郊去踏青掃墓的人非常多，衛兵也不可能有時問去一一細查。我之所以選擇這一天去西郊，理由就在這一點上。

出了西直門，我暗自鬆了一口氣。但對同伴們依舊守口如瓶。上午十點鐘到達西山。稍作安頓，我立刻藉故離隊去辦公事。我先到設在清華的十七區黨部，然後依次到燕京及中法兩大學，之後又到西山中學和香山慈幼院等處。馬不停蹄，滿山遍野的跑，趕着傳遞市黨部公函指令，收集下級黨部的呈文情報，視察各區分部，研究成立區黨部以及吸收黨員。開展外抗軍閥統治，反抗帝國主義的愛國活動。真是忙得不可開交，直到下午五點鐘才一切就緒。

黃昏和大家見面，胡成之就說：「咱們今兒玩了一天，老吳不知搞什麼名堂，溜到哪兒去了，沒和大伙兒一塊兒，真可惜！我覺得與猶未盡，咱們索性今兒晚上不回去好不好？」我說：「不同去就在這裏住一晚。」他說：「明天咱們一早起來去逛西山八大處，玩兒個痛快。咱們今兒晚上找個旅館開兩個房間，一住男，一住女，旅館錢歸我。」我說：「兩個房間不夠，要開三個才行。此外今晚的飯錢也要想法子。」他說：「房錢飯錢全歸我。」這一來他付的錢和我付的也差不多了。

國共兩黨同志被捕

第二天（四月七日）晨起看報，頭條新聞赫然在目。原來就在四月六號那天早上，北京城裏發生了天大的亂子：東交民巷內俄使館，中東鐵路辦事處，俄國遠東銀行，以及俄國庚子賠款委員會全都被軍警包圍。李大釗先生以及他的手下，國共兩黨同志凡在俄使館及中東鐵路辦事處的，一個也沒逃掉，全給捉去了！胡成之看了新聞之後對我說：「老吳呀！你真是狗運亨通。你要是在那兒，沒邀我們出來遊玩，這次也一定給逮去了。」我說：「那倒不一定，也許昨天我沒在俄使館呢？」他看情況嚴重，就建議我說：「西山有一條路直通通州。我給你雇個車先到通州，再搭火車去天津。你趕緊走吧！」我說：「那麼麼成呢？今天我們黨發生這麼重大的一件事，我怎麼能溜呢？我負責交通宣傳工作，不是沒有職務的人。究竟有多少人被抓去？都是什麼人？如

何善後？全都要有人來處理。」他說：「說的也是，那該怎麼辦呢？」我說：「首先要儘快通知同志們搬家，以免秘密機關被逐個破獲。同時也要趕緊設法救人。無論如何總要盡人事。所以一定不能逃，要進城，不過八大處照逛。」

逛完八大處，雇了七、八頭驢子進入西直門，然後從西直門乘電車進城，回到北大。

到了北大就感到氣氛凝重。那時北大第一區黨部共有三個委員，只有我是國民黨，另外兩位全是共產黨。一個叫譚融葵，四川人；另一位姓黃，名字忘了，湖南人。找到譚融葵，我問他：「譚同志，怎麼樣了？這回出事有那些人被抓去？李大釗先生是不是真的也被抓了？」他說：「沒有。」我說：「喂！譚同志，今天不是你們共產黨一家子的事，而是我們國共兩黨的事。你要實話實說，該怎麼辦就怎麼辦！」於是他低聲對我說：「你可不能對外面講啊！都抓去了。因為怕他們在那兒不承認是本人，如果我們在外面一喧騰，反而證實了他們的身分，那他們就沒命了！」聽了這番話，使我深深感受到共產黨組織的嚴密，黨員言行的確受過訓練。比之共產黨，當時的國民黨就顯得沒有什麼嚴密組織可言了。即令有組織，也是幾個零星的小組織。當時的小組織有「大同盟」和「實踐社」較有名，另外如「與中社」那時還沒加入國民黨。

李大釗等悲壯就義

事變發生後，我們這些年輕幹部曾開過一次大會，商討如何搶救被捕同志的事。當時年紀太

輕，社會關係不夠，所以雖然急得像熱鍋螞蟻，日夜焦慮，到處奔走呼救，但均徒勞無功。因為這件案子實在太大了，不要說我們這些沒有社會背景年輕人，即使是當時有聲望、有實力的知名之士，如湖南同鄉會所請出的楊度、章士釗（李大釗先生至友）等人也都無補於事。最後大家只有眼睜睜的看着李大釗、路友于、鄧文輝等二十位同志，一個個活生生的被絞死。這些同志們就義之悲壯，在革命史上僅次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這個案子，張作霖辦得很快。四月六日抓人，四月二十八下令組織特別軍事法庭秘密會審。當日上午審理，下午判決，一經宣判立刻執行！李大釗等二十名同志均被絞死。刑場設在絨線胡同，司法部後街的地方審判廳看守所。屍體殮後暫厝定武門外下斜街的長椿寺。四月廿九日，受刑人的姓名、罪狀和照片都刊登在報紙上第一版。二十位遇難者如下：

第一名李大釗：字守常，直隸樂亭人。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及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畢業。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兼歷史系教授。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委員。

第二名路友于：原名汝梯，山東諸城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國民黨第一屆候補中央委員。北京政治分會委員。北京特別市黨部監察委員。

第三名鄧文輝：湖南沅陵人。北京大學學生。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委員。

第四名張挹蘭：女，湖南人。北京大學教育系學生。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委員兼婦女部部長。偏共。

第五名譚祖堯：廣東人。北京美術專門學校畢業。第六名謝伯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

第七名姚彥：湖南人。北京中國大學學生。

第八名范鴻勛：湖北鄂城人。北京大學畢業。國民黨員。

第九名莫同榮：廣東人。北京朝陽大學學生。國民黨員。第十名李崑：北京大學學生。

第十一名方伯務：湖南人。北京美術專門學校學生。第十二名鄭培明：山東人。北京中國大學學生。

第十三名吳平地：四川人。北京師範大學學生。第十四名李瑩蓮：女。不詳。

第十五名張伯華：不詳。

第十六名閻振三：不詳。

第十七名楊景山：直隸人。北京大學學生。共產黨員。

第十八名謝承常：不詳。

第十九名英華：不詳。

第二十名陶永立：不詳。

以上各人資料記得並不完全。其中記得有十三名為國民黨黨員，七名為共產黨黨員。他們全是國共兩黨中堅幹部。李大釗先生，前面已介紹過，他是中國共產黨元老，國共合作時期，他是兩黨北京最高實際負責人。路友于先生是國民黨在北京方面主要負責人，是丁惟汾先生最賞識極優秀的同志。鄧文輝和莫同榮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們都是中山主義實踐社的同志。張挹蘭同學本來也是國民黨黨員，後因故加入共產黨。

李大釗先生在行刑的時候叫了一聲：「天啊

！悲痛哀鳴，可見他內心充滿了怨氣。

用熱血爲國軍開道

收屍的時候情況至慘。二十具屍體，個個面部扭曲，突睛吐舌，顯示在斷氣的時候痛苦萬分。這裏有我敬愛的師長、情同手足的至友、朝夕共處的同志。這是我生平第二次經歷同同志們死難的大場面。張作霖真是喪盡天良，慘絕人寰。我們收屍的同志既悲痛他們的慘死，但同時也更堅定了我們誓死與北洋軍閥拚鬥到底的決心。

事實證明，同志們沒有白白的犧牲，我們的血汗沒有白流。在民國十七年六月，我們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終於高高的飄掛在北京城樓上了。然而，在國民革命軍未光復京津之前，已有多少愛國志士以他們的生命和熱血爲國軍開道洗塵！在京津城頭隨風飄蕩，鮮明燦爛的國旗下又有多少英雄在那兒含笑鼓舞！

李大劍先生德配趙劬蘭女士伏屍痛苦，椎心泣血，令人不忍卒聞。李夫人比李先生大八歲，因爲依北方的風俗，父母怕自己的年紀大了，不能照管兒子，所以在兒子十歲左右，就給他娶一個比他大得多的媳婦（通常大八歲左右），一方面照顧兒子，一方面幫忙作家務。等兒子大了以後再圓房。李夫人哭到後來，嗚咽抽搐，斷斷續續的說：「唉呀！你天天喊無產階級，勞苦大眾，爲他們奔走賣命，今天落得這個下場，以後誰來照顧我們孤兒寡婦！」哭得我渾身熱血沸騰，激動傷心不已，要想流淚，又不敢，怕給周圍偵緝隊看到暴露身分。只好強忍住淚水對李夫人說

：「師母，您不要哭了。李先生泉下有靈，他會保佑您的，您們會有光明的前途的，您等着吧。不要哭了，回家吧！不要哭了，回家吧！」同志們終於在極大的危險下，完成收屍的工作。

赤化中國的大陰謀

自民國十五年春，「三一八」慘案發生以後，北京俄使館成爲國共兩黨北方秘密機關總部，已是中外周知之事。張作霖爲了對抗北伐軍，拔除心腹巨患，決心釜底抽薪，查抄北京俄使館，企圖將兩黨精英一網打盡。

依辛丑條約，中國軍警不得進入北京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爲此張作霖先是派兼外長顧維鈞出面與日、英、美等國交涉。顧不敢負此重責，推諉延宕，最後由張另派專人與各國使館秘密磋商，迭經波折，終獲東交民巷駐華使館同意，允以相當條件，准許中國軍警入內搜查，而由使館領袖荷蘭公使歐登科主其事。

四月六日上午，京師警察總監陳興亞得到張作霖命令後率領軍警便衣三百餘人，包圍東交民巷，並備一紙公文，聲稱俄使館內的中東鐵路辦事處、遠東銀行、中蘇庚款委員會等處，有國共兩黨人陰謀暴動之秘密組織，事機迫切，立須搜查，請准入內等由。同時並由張作霖派外交人員吳晉與荷蘭公使歐登科達成協議，由荷使就警察廳公文簽字放行。隨即展開搜查。結果逮捕國共兩黨黨員七十餘人，俄人十五人，並搜出俄製槍械、彈藥及蘇俄赤化中國之重要文件多起，可謂滿載而歸。

被捕的七十餘名黨人中，國民黨黨員占多數。嗣經特別法庭秘密審判結果，除李大劍等二十名因情節重大，於四月二十八日即日處決，已如前述外，二十九日將情節較輕之舒啓昌等四名各判有期徒刑十二年，李雲貴等六名各判有期徒刑二年，其餘四十餘人，發交京師警察廳處理。其與案情無關者，旋予釋放。至於被捕的十五名俄國人，在北京政府垮台後，均被釋放回國。

張作霖查抄北京俄使館，國民黨的犧牲雖然很大，却也發現了蘇俄赤化中國之陰謀。抄查中，自俄使館發現蘇俄赤化中國的政治及軍事秘密文件，達數十箱之多！這些文件扣在京師警察廳，並作公開展覽。後更選擇其中重要的譯成中文，有百萬餘言，輯成「蘇俄陰謀文證彙編」一書發行於世。從此，所謂第三國際，俄共利用中共陰謀赤化中國的野心和計劃，遂昭然若揭了。

共產黨保密的功夫真是到家。當時國民黨有那麼多幹部天天和他們並肩作戰，常常生活在俄使館同一屋頂之下，雖然我個人對他們曾起過懷疑（見前文），卻沒想到他們正在進行如此巨大的陰謀。就在北方及南方政府相繼和蘇俄斷交之後，它乾脆撤去和善偽裝，而專走暴力路線了。例如由毛澤東、周恩來等所搞的兩湖秋收暴動、海陸豐暴動以及廣州暴動等全是直接的後果。

查抄事件幾點見解

東北改旗易幟歸順國民政府以後，有一部份人對張作霖查抄北京俄使館一事，不獨予以原諒，而且加以好評。我以一個身與共事的歷史見證

人的身分要略抒一下個人的意見：

第一、我認爲，論者因這件事，把張作霖塑造造成「反共英雄」，並每於有意無意之間，將俄使館內所捕去之學運份子一概目爲共產黨人，或其同路人，未免忽略事實，持論不公。前文說過，張作霖查抄俄使館，目的在對抗北伐軍。查抄的結果之一是發現了蘇俄赤化中國之大批文件。這對國民黨以後的清黨或者有些許影響。但這一大發現純屬意外。如果說張作霖對「亂黨」的痛恨有十分，其中屬於痛恨共產黨的有四分，恐懼國民黨的倒有六分。這一觀點可從其後張作霖之加緊捕殺國民黨人獲得證明。

第二、「聯俄容共」是中山先生的決策。一方面是因應時勢的需要，一方面是出於他恢宏的胸襟和民主理念。當時跨黨份子中並非絕對沒有服膺中山先生信仰三民主義的人（例如李大劍先生就對中山先生極爲崇敬，也甚得中山先生器重，提名爲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而且當時不論國民黨或共產黨，大家一致的目標都在打倒軍閥。爲此目的，在北京的學運中，最早期的共產黨不是完全沒有犧牲和貢獻的。在中共的創始人中，例如號稱「南陳北李」的陳獨秀和李大劍，說他們思想偏頗，手段激烈，爲第三國際所利用則有之；說他們處心積慮禍國殃民，則未必。

第三、二十名死難者中，國民黨十三人，共產黨七人。國民黨中路友于、鄧文輝、莫同榮諸先生都是極忠貞，極優秀的黨員。如今若干論者爲了「標榜反共」，不但認爲七名共產黨員死有餘辜，就是十三位國民黨員也被污蔑成了「該死

的共產黨」而罪有應得。我想路、鄧、莫諸同志九泉有知，也難免要唏噓慨歎不已吧。可見近人評論張作霖查抄俄使館這件事，大都漠視了時代背景因素，犯了「以偏概全」，「以今非昔」的毛病。

第四、事件發生前後，李大劍先生始終是重心人物。在近代史上李先生功過如何呢？下面是我個人對李先生的認識和評語。在李先生遇難之前，約有一年的時間，我和李先生由於工作上的關係，幾乎天天見面。當時李先生在學界是北大圖書館主任兼歷史系教授，是我的老師。在政界爲國民黨北京政治分會的最高實際負責人，是與我們共患難的長者。我們之間的師生同志感情相當深厚。

李先生是直隸樂亭人。出身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國學造詣深厚，日、英文也具相當根底。好學深思，善析是非，關心國是，熱衷政治改革，一生對於政治方面的論著很多。李先生爲人謙和有禮，對青年尤多獎勵激勵。道德、文章俱屬一流。

李先生的政治關係異常複雜；與同盟會及進步黨等都有很深的淵源。最後他加入了第三國際，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民國六年，是李先生政治生命的轉捩年。在此之前，他主張和平漸進的政治改革；自此以後，他言論日趨激烈，行動日漸傾向於暴力。爲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呢？我認爲這與當時的政治環境，以及李先生個人的遭遇有關。在政治環境方面，辛亥革命以後，同盟會分裂，致使袁世凱得逞，暗殺陳英士

、宋教仁等革命領袖，陰謀帝制，接受日本二十一條，使中國的國際地位低落更甚於「次殖民地」。內憂外患，交相並迫，有志之士無不努力奮鬥，希望爲國家尋出路。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以列寧爲首的共產黨，以及組織紅軍的托洛斯基，合力推翻沙皇，建立蘇維埃共和國。李先生目睹國內外的政情變化，因而附和列寧聯合世界上被壓迫民族，以武力反抗殖民帝國主義的主張。在個人遭遇方面，他曾遭遇各種政治鬥爭，派系傾軋，這一切令他逐漸相信，和平漸進的政治改革，似乎只適用於成功的政治革命之後。依常理而言，以李先生的愛國情懷，應不致甘心爲國際共產黨所利用。然而後來他又爲何非常積極的搞什麼「社會主義研究會」、「社會主義青年團」，進行赤化中國的大陰謀呢？這大概是所謂的「既上梁山身不由己，已入圈套愈陷愈深」吧。關於這一點，可由他最後對共產主義的覺悟：「循着蘇俄發展的路走，怕要走向沙皇專制的老路！」一語道破。李先生是一位道地的書生，本性絕不類似毛澤東之陰狠毒辣。我相信他如果不死於俄使館事件，最後難免與陳獨秀同其命運——被開除黨籍。

時代悲劇難脫其罪

撇開政治立場不談，就人論人，就事論事，李大劍先生的人品、學識以及他對共產黨的忠心，對無產階級勞苦大眾的實力，在在都令我敬佩。他的慘死，只能說是一個時代的悲劇。當然若就歷史發展的因果關係而言，後來毛澤東的「文

我的父親吳鑄人

●吳又熙（國立清華大學外語系副教授）

家父一生奉行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教，為實現中國之民主自由平等，投身愛國救民的革命工作，歷盡艱難險阻，不憂不懼、無怨無悔，他晚年的一個願望就是把一生事業中兩個轉捩點寫出來，使更多的人對現代中國史上的問題有多一重的了解。家父由於心臟病，於民國七十三年五月三日下午突然逝世，他留下的作品除一小部份已經寫成文字之外，大部份是還沒有經過整理的錄音帶。為了紀念父親，更為了完成他的這一心願，筆者於三年前利用一個暑假的時間把他老人家的回憶錄全部整理成文字。在整理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人的名字。家父記憶力極強，所有和他有過接觸的朋友的姓名那怕過了幾十年仍記憶不忘。可是當我要從錄音中把這些人的名字轉換成文字就困難了。第一、中國同音字極多，第二、家父安徽口音很重，如果說得又快，就很難猜出是什麼字。為了克服這困難，在文稿整理好了之後，一一寄請家父過去的朋友、學生過目，請求指正。在此我要特別感謝王光仁老大哥，他的費時費心的指正使文中許多錯誤獲得改正。當然，這並不是說文中就不再有了錯誤了，所以讀者中有指正的都歡迎提出來，我們由衷感謝。

讀者或許在讀過家父回憶錄後，也想知道一點他在子女心目中是怎樣的一位父親。我們的回答是：他是一位最能培育子女自尊心、自信心的父親。記得小時候父親常說：我的兒女都是天下第一。小時候不懂事也自認自己是天下第一。但稍長之後入學與同儕相比，發現自己並非處處比人強。但父親的言辭一直激勵着我們，雖在坎坷失敗的打擊之下仍不失去自尊和自信。

父親不只在言語上幫助了他的孩子們建立起自尊與自信，他更用實際的家庭生活幫助我們養成有自尊和自信的習慣。從小到大雖然我們全很皮，但絕少受父親的責打。記得小時父親要送我入學，帶我去見校長，在他和校長談話時我就暗暗在下面掐父親的手表示我的抗議——小時對「上學」有一種莫名的反感——回來後看到父親手上多處紫紅甚至出血。因此責打了我——那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挨父親的責打。長大之後問父親，當時為什麼那麼沉得住氣？他說：如果我當着校長責罰你，你的自尊心一定會受到打擊，回來之後如果不罰你，怕你將來忤逆犯上。還記得一次考小學插班，考試結果是「倒數第一名」。我只聽到個「第一名」還很高興。父親見我興高采烈，就對我苦笑，拍拍我的頭說：考上就好了，好好用功，以後一定能考個真正的第一名。父親去世轉眼已九個年頭了，我們非常想念他。中外雜誌決定連續刊出他老人家的回憶錄，發行人王成聖先生鼓勵，囑我寫一篇簡單的紀念文字。在這謹向王先生致謝。八二年清明於國立清華大學

化大革命」等專政暴虐，大陸同胞的苦難歲月，追本溯源，「南陳北李」難推其罪。

在此，我要談談查抄俄使館事件的兩個要角：張作霖和羅文幹。張作霖出身綠林草莽，滿口的「他媽拉個巴子」，動不動就「斃了這小子」，一派鬻匪氣概，軍閥作風。奉軍軍紀之壞，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我們可以說張作霖是一個有政治野心，却缺乏政治頭腦的民初權力人物。從民國十五到十七年，張作霖駐紮北京。在這段期間，被捕殺的國民黨人不計其數。我本人也曾先後兩次幾乎陷入他的魔掌（後詳）。因此依我看，張作霖查抄俄使館主要出於他個人的政治野心，而非出於他的什麼政治理念或思想。所以在這件事上，我們只能說他所扮演的是一個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的主兇，絕對不能把他美化成深明民族大義的反共英雄。

至於羅文幹，他在查抄俄使館屠殺黨人事件上，應當算是「主幫兇」。當初張作霖秘密安排派兵入使館區，其他各國已無異議，唯有日本，依據辛丑條約堅決反對。負責代表張作霖出面和日本協調的就是羅文幹。羅之終能取得日方之諒解，主要是由於抓住了日人恐共厭共的心理。由於日本的妥協，張作霖方能放手大幹。所以我認為羅是這次慘案的主要幫兇。對這樣一位幫兇的角色，後來國民政府竟任用他作部長，這是我們所犯的一件不可赦的錯誤。不錯，後來由於國共分裂，使情勢發生改變，但不可忘記張作霖等的屠殺行動主要是要打擊北伐，阻止國民革命軍統一中國。（未完待續）